

## S.4654《巡礼仙岳》组诗再探 ——读张先堂《S.4654 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札记

冯天亮  
(湖南 长沙 410000)

**内容摘要** S.4654 文书中“巡礼仙岳”等五首诗歌,研究者颇多。本文针对张先堂先生《S.4654 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一文再作探讨,更新标题为《巡礼仙岳组诗》,重新校释确定组诗的文字内容;并从作者身份、诗歌内容、创作时间及文卷段落关系等方面进行考论,认为组诗中《巡礼仙岳诗二首并序》之作者当为晚唐敦煌诗僧悟真。

**关键词** 敦煌文书;诗歌;张先堂;校释;考论;悟真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2)03-0082-09

## Restudying the Series Poems *Trip to Xian Yan* on S.4654 ——A Reading Note on Zhang Xiantang's Treatise

FENG Tianliang  
(Changsha, Hunan)

**Abstract** :The five poems including *Trip to Xianyan* have been studied often. This paper is a reading note 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ate Tang Tour Poems on S.4654* written by Zhang Xiantang. On the basis of Zhang's research, this paper further researches these poems and suggests that the poems can be renamed as *Series Poems: Trip to Xianyan*. By re- interpreting the texts of these poems and studying the contents, time of cre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aragraphs,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poet, it concludes that two poems of the five were written by Wu Zhen, a late Tang Dynasty poet monk.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Poems; Zhang Xiantang; Revising and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Wu Zhen

关于 S.4654 文书中“三危极目条(眺)丹霞”等一组五首诗歌,著录、考释及研究者甚多,以张先堂先生《S.4654 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以下简称

“张文”)<sup>[1]</sup>最为精审。张文对诗文之释读,在诸家录文中最为接近原卷文本;于五首诗之作者、诗意及相关问题考证颇多精义。其中最胜者为考证二位和

收稿日期 2011-11-27

作者简介 冯天亮(1960—),湖南长沙人。自由职业者。

诗作者延谔、塘彦为晚唐敦煌人张延谔、汜塘彦,遂为考定此组诗歌之年代、背景等奠定基础。张文发表十数年来,诸家相关著述收录、论证此组诗者,多有参考张文,明征暗引,足见张文份量之重。鄙人偶读张文,颇受启发,细较原卷,并参阅相关材料,以为犹可再加探讨,乃以此札记,就教于张先生及读者诸君。

## 一 关于原文释读

张文录诗虽较完善,犹有三处显误。

1. 第一组七绝之第二首第二句,张文释为“手执香积蹈红莲”。谨案:“执”当作“持”,文卷正面、背面两处手写均清晰易辨。“持”为平声,“执”为入声,若作“执”则违律也。

2. 《延谔奉和》第一首第一句,张文释为“南阳一派应天恩”校记云:

“南阳一派应天恩”一句,项录(谨案:指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引者)作“南阳一雨应天恩”。按:项录此句句意不通,颇疑“雨”字误录,经细审原卷并反复揣摩研读后方弄清,原卷卷背所抄此字隐约似“雨”字,而正面所抄此字则作“水”,“水”实系“派”之草书,“派”又系“派”之俗写。“南阳”指晚唐沙州归义军张氏的郡望,“南阳一派应天恩”意谓归义军张氏家族荣膺了大唐天子的恩赏。如此校录则句意豁然贯通矣。

谨案:原卷背面所书,确系“雨”字无误,然句意不明。正面作“水”字,非“水”字,更非“派”字,作“水”字是。关于“南阳一水”,说见下文。

3. 《延谔奉和》第二首第三句,张文释为“从此穿涉无虏骑”。谨案:“涉”当作“沙”,正面、背面所书皆清晰可辨。本卷正反面文书中屡见“沙”字,皆可参校。文卷正面此诗后接《百缘经略要》,第二行“无事不能远涉”,“涉”字与“穿沙”之“沙”字差异判然。“穿沙”者,穿过沙漠,指外族入侵也。“沙”为平声,“涉”为入声,若作“涉”,平仄不协矣。

另有三点补充:

1. 诗序末句“裁成短句”。谨案:“成”原卷作“城”,假借字。当出校记。

2. 第一首第一句张文释为“三危极目耸丹青”。谨案:文卷背面作“耸”,而正面作“條”,《英藏敦煌

文献》将正面第一首七绝拟题为《三危极目條(眺)丹青诗》<sup>[2]</sup>,释读甚确,鄙意应作“條(眺)”字,说见下文。

3. 第一首第二句张文释为“万里□家去且遥”。谨案:文卷正面“且”字写作“不”字,误。鄙意此处“家”字前当脱“离”字,后阅《全敦煌诗》此诗校记<sup>[3]</sup>,亦以为脱“离”字,固已先得我心矣。

张文刊布之后,又有多家考校,然亦时存讹误,聊举二例。

《敦煌石窟僧诗校释》收录此组诗,题为《三危诗并序二首》,又附和诗二首,一题为《延谔奉和(一首)》(谨案:该书以延谔绝句二首误作律诗一首)、《又塘彦不揆荒无(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一首)》<sup>[4]</sup>,多采用张文成果。如考证延谔为张延谔、塘彦为汜塘彦(文中作塘彦),皆已见于张文。《三危诗并序二首》题为“佚名”,题解曰:“故知他们三人都是登临三危的同游者,并知《三危诗并序二首》作者,为外地巡礼仙岩的名僧。”此“故知”、“并知”皆无考证,当系采录张文成果而不明言。又书中所作校勘多有误处。如《三危诗》第一首第二句“万里□家去且遥”,“家”字前或字后脱去一字,汪校作“万里家乡去且遥”,于义似未尽妥。第三句“满眼同云添塞色”校记云:“同云,即铜云。”考“铜云”为古代青铜器皿之云形纹样,与“塞色”实无关联。又《延谔奉和》之首句作“南阳一两应天恩”,校注云:“原卷作‘一两’,是。‘一’,指议潮;‘两’,指议潭和淮深二人。他们三人都是应天恩的。”其说颇嫌穿凿,古诗中“一两”从未见有此用法者,且原卷(背面)实作“雨”而非“两”。第三句作“古迹功臣居溪内”,校记云:“古迹功臣,原卷作‘功臣古迹’,既与颌联对仗未全(‘敦煌伊比’),也为拗句,或为书手误倒耳!今依诗律与对仗校为‘古迹功臣’。”案:此句虽格律失粘,然本为绝句二首,无所谓对仗。汪氏误作七律一首,故有对仗之说。即使改为“古迹功臣”,与“敦煌伊比(应为北)”亦未成对仗,且“古迹功臣居溪内”,本句平仄已不合,更不可与“颌联对仗”,“古迹功臣”亦不成语。

《全敦煌诗》收录此五诗,分别置于张延谔、汜塘彦及无名氏之名下,其书似未参考张文,所录字

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7册,第3034、3037页,第10册,第4378页。

句多有讹误。如张延钊《延钊奉和二首》其一首句“南阳一张应天恩”，校记引“徐（俊）辑校”，比照诸多敦煌文书，以为“水”字为“张”字之俗写，例证虽多而无当。如云 S. 6981(A)《辛丑至癸亥灵修寺诸色斛斗入破历计会》、P. 3721 背《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科至目断官员》中之“张”字多作“水”字形，细审之，二卷所谓“水”字与“南阳一水奉天恩”之“水”字，笔顺写法均有不同。是“张”字俗写固有近似“水”形者，而“水”字未必皆可释为“张”字。即以 S. 4654 本卷论，正面此组诗后接写《百缘经略要》，第十二行“有大海水”之“水”字与“南阳一水”之“水”字笔顺、笔势及字形皆同，断不可读为“张”字；卷背有《丙午年正月九日至三月四日金光明寺僧庆戒出便斛斗历》第五行“张清奴”之“张”字，并不作“水”形。此处可见文书俗字、草字、假借字之辨识，当依据文书性质、内容、年代、书手及书体之不同而定，不可以此律彼，定为通例。依句法平仄，此字必为仄声，“张”字平声，故不合。又《延钊奉和二首》其二第三句，书中作“从此穿涉无虏骑”，“涉”字亦误。

总之，管见所及，“三危极目眺（眺）丹霞”等五诗，迄今未见完全准确之录文，故依原卷重录于后。前二诗疑为沙门悟真所作（说见下文），总诗题及前二首诗题，皆直取诗序首句，标为《巡礼仙岳》，似更现成。以前诸家之标题，此不缕述。

### 巡礼仙岳唱和诗（五首）

#### 巡礼仙岳二首（并序）

巡礼仙岳 经宿届此。况泉泉圣地，昔  
傳公之旧游；月窟神踪，仿中天之鹫岭。三  
危峭峻，映宝阁以当轩；碧水流泉，绕金池  
而泛艳。中春景气，犹布同（彤）云，偶有所  
思，裁城（成）短句  
三危极目眺（眺）丹霞，万里□（离）家去且遥。  
满眼同（彤）云添塞色，报恩终不恨征辽。

今日同游上碧天，手持香积蹈红莲。  
灵山初会应相见，分明收取买花钱。

#### 延钊奉和（二首）

南阳一水应天恩，石壁题名感圣君。  
功臣古迹居溪内，敦煌伊比（北）已先闻。

东流一带凝秋水，略尽横山地色分。  
从此穿沙无虏骑，五年勤苦扫风尘。

#### 唐彦不揆荒无（荒）聊申长行五言口号

宝阁下云崖，灵龕万户开。  
涧深流水急，林迴叶风催。  
香露凝空下，祥花雪际来。  
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

## 二 《巡礼仙岳二首并序》作者疑为沙门悟真

张文以为《巡礼三危二首并序》之作者身份为僧人，允为卓识。惜未顺此思路，深考此僧之名姓事迹。愚意此僧非他，即敦煌大诗僧、政治活动家悟真和尚（811-895）是也。其理由有四：一曰身份恰合，二曰诗意恰合，三曰时间恰合，四曰文卷内容关联密切。

### 1. 身份之考察

张文云：

佚名僧人所写诗序采用四六骈文，遣词精工，藻采典雅，诗文写景状物，如在目前，即景抒怀，意境深邃，反映出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诗中使事隶典，多采佛经，显示他精熟佛典，具备相当的佛学造诣。他游览莫高窟即兴赋诗，由敦煌贵公子张延钊和名士汜唐彦陪同奉和，且对其出语谦恭，表明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高僧。

谨案：此段勾勒，若施于悟真，俨然确切不移。悟真生平事迹及创作，学者多有钩稽论述，此处不作详述。夫称悟真为“大诗僧、政治活动家”者，盖与《巡礼仙岳二首》极有关系也。以二诗论，非深于文学，不能有此诗；非高僧大德，不能有此语；非与沙州当局渊源甚深而又身历当日敦煌时政者，不能有此感慨。三者兼于一身者，洵非悟真莫属。

悟真之文学、佛学造诣，从敦煌遗书现存可确认之作品即可见知（未能确定而疑为悟真之作品者亦不在少数）。长安千福寺僧子言所作《美瓜沙僧（悟真）献款诗》赞其“博贯词多雅，清谈义更长。”

P.3886，“贯”字，学者或释作“文”（陈祚龙），或释作“笑”（张先堂），或释作“学”（汪泛舟），似皆不妥，愚意当释为“贵”。

所谓“词多雅”指文学造诣;所谓“义更长”指佛学修养。长安荐福寺高僧栖白亦尝赠诗称道悟真“艺行兼通释与儒”(P. 3886《奉赠河西真法师》),决非泛泛溢美。

悟真一生之政治活动,可于敦煌遗书中考见之,大致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为吐蕃占领瓜沙时期,悟真借宗教活动吸引信徒,所谓“能以空王之法,革其异类之心”(敦煌石窟《洪辩碑》上段,此语为唐廷对洪辩、悟真二人之褒评)。第二阶段为张议潮率众起事驱除吐蕃时期,悟真“随军驱使,长为耳目”(P. 4660 苏颋:《河西都僧统悟真邈真赞》),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第三阶段为大中五年(851)及其后,悟真奉命入京,向唐廷献捷,深获唐廷褒扬宠锡。回敦煌后,主持河西佛教事务三十余年,以宗教领袖身份参与敦煌政治活动,可谓德高望重,名动朝野僧俗。其身份地位,正与《巡礼仙岳》诗作者相符。

张文云:

笔者认为,此佚名作者当是一个由内地游方而至敦煌的僧人。

又云:

佚名作者自称“巡礼仙岩”,表明他是一位巡游来到莫高窟礼拜的僧人。

谨案:愚意以为未妥。所谓“巡礼”,非仅于张文所谓“是指僧人远行他方礼拜寺庙、圣迹等的一种修行活动”,近地巡游亦可称“巡礼”。如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勋业新城大梁镇,恩荣更守洛阳宫。行香暂出天桥上,巡礼常过禁殿中。”(《全唐诗》卷385)“天桥”与“禁殿”皆在洛阳城内,非远行而亦称“巡礼”。敦煌文书《唐沙州千佛洞李氏重修功德记》中亦记张议潮女、李明振妻张氏“巡礼仙岳”(P. 4640),可证“巡礼仙岳”为敦煌本地常见活动。悟真此次巡礼时在中(仲)春,当为二月八日佛陀出家日行像、礼拜活动。晚唐五代时,此日敦煌僧俗例作佛事,仪式极为隆重热闹。悟真此次巡礼活动历时二天,经宿乃登仙岳,陪同者有张延谔、汜瑭彦诸人。

张延谔为张议潮之孙,张淮深之第四子,时任何职不可考知。汜瑭彦乾宁三年(896)之署衔为“行燉煌县尉、兼管内部支计使、御史中丞”(S. 2113《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官职不高。然汜姓为敦煌大族,观 S. 1889 残存之《敦煌汜氏家传》即知,所谓“龙沙鼎鼐,盛族孤标”(P. 4640《唐沙州千佛洞李氏重修功德记》赞汜

氏夫人语)。张文称张为“贵公子”、汜为“名士”,甚确。

悟真学兼儒释,阅历丰富,情性亲和,学问雅博,张、汜二人于悟真为后辈,为学生,或更为俗家弟子,必常随悟真左右,三人当为忘年之交,时相酬唱。二人或称“奉和”,或称“不揆荒芜”,皆“出语谦恭”,固在情理之中。三人巡礼唱和之间,隐然有无须点破之“今典”、“乡典”、“家典”,有不必言传之默契,虽称唱和,然和诗既不依原唱之体裁声韵,主题意旨亦不尽相同,各书所思所见,无多客套,写景写事,多有关涉敦煌历史地理及当时政治时事。若寻常游方和尚,即使年高望重,若路经敦煌,巡礼名胜,宾主之间,未免客气有馀而真情不足,与张、汜二人之关系不至如此亲切。若为异地僧人,则其身为游客,不当首唱,纵作首唱,诗序亦当谦抑客气,如“呈某某一晒”之类。张、汜二人,或恃节度公子、本地名士之威势与之隐然抗衡,或以边地后生而自我拘束,和诗亦必涉及宾客,为题中应有之义,皆不能如此五首唱和诗之平淡而真切。故以三人关系考察,首唱者为外地僧人之说,恐难成立。

## 2. 诗意之考察

张文云:

作者是一位晚唐时由内地来到敦煌巡礼的佚名僧人,从“万里□家去且遥”、“报恩终不恨征辽”的诗句推测,其行踪尚不会以敦煌为终点,故很有可能他是在晚唐时代西行求法的背景下来到敦煌的。

谨案:张文从“万里□(离)家去且遥”之句,推测诗作者万里而来,且又将离去,故“行踪尚不会以敦煌为终点”。此说尤可商榷。若结合悟真之“行踪”解读,则知“万里离家去且遥”乃指悟真大中五年(851)长安报捷之行。时悟真受张议潮之委托,“间关犯险,远走数千里以奉使长安”(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语)。此行关系重大,悟真既不辱使命,且获极大荣誉,故终身以为荣耀,屡入吟唱。如:

远涉风沙路几千,沐恩传命玉阶前。

墙阴藿意初朝日,涧底松心近对天。

(S. 4654V)

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

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至立一生身。

(P. 2748《国师唐和尚百岁诗》十首之七)

所谓“远涉风沙路几千”,所谓“万里崎岖远赴秦”,即《巡礼仙岳》第一首第二句“万里离家去且遥”之意也。



张文云：

此句中的“报恩”一般很容易理解为是指世俗的“报君恩”，但上文已排除了佚名作者是“戍边将士”的可能性，故此处的“报恩”当不可能是指“报君恩”。其实此处的“报恩”是释门用语，其含义远比世俗的概念丰富，因为佛家本有“报四恩”（父母恩、僧恩、国王恩、檀越恩）之说。

谨案：其实不然。悟真此处所言之恩，即前引二诗“沐恩”、“承恩”之“恩”，乃国恩皇恩也。前引诗中“墙阴藿意初朝日，涧底松心近对天”，恰为“报恩终不恨征辽”之注脚。

张文又云：

此诗中的“征辽”并非喻指戍边，而是用其字面本义，即指征途遥远之意。

谨案：此说近矣，而犹未尽。悟真尝直接参与收复河西之军事活动，虽僧徒而有军功。“赞元戎之开化，从辕门而佐时。军功抑选，勇效驱驰。”（P. 4660 苏翬《河西都僧统悟真邈真赞》）故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云：“河西归义，缁流（僧人）亦与有功。”（《丙寅稿》本）并首举悟真为“缁流有功”之例。悟真此处用“征辽”一词，与前引《百岁诗》第七首之“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诗句前后一贯，隐然以战士自居，更富政治意义，非仅指寻常游方远行也。

此诗首句，S. 4654 背面作“三危极目耸丹青”，而正面作“三危极目條丹青”，“條”当为“眺”之同音假借。张文云：

“三危极目耸丹青”意谓极目远眺只见三危山高高耸入云霄之中，这显然是写莫高窟所见之景。

谨案：如此释读，则诗句仅写三危山之高，与诗之后文关联不紧。若作“眺丹青”，则自三危远眺长安，勾起回忆，诗序所谓“偶有所思”，乃有下文“报恩原不恨征辽”之感慨。故“眺”字义胜于“耸”字。悟真有诗回忆大中五年在长安“亲对龙颜”之情景，云：

重云缭绕拱丹青，圣上临轩问百寮。  
龙沙没落何年岁？笺疏犹言忆本朝。

（S. 4654V）

“拱丹青”与“眺丹青”，地点不同，景象各异。“丹青”非谓“高入云霄”，乃指唐代醴泉宫中之丹青殿（又作丹青楼），借指皇居所在也。悟真登临三危

极顶，“偶有所思”，当即思忆大中五年长安报捷、丹青殿君臣对问之情景。杜甫名句：“每依北斗望京华”，乃身处僻地，关注朝廷之意。悟真之“三危极目眺丹青”，正与杜诗意同。

《巡礼仙岳》第二首乃依诗题原义叙写仙岳巡礼，兼及张、汜二人同游之乐。“手持香积蹈红莲”，张文已详注“香积”而未释“红莲”之义。佛教中之红莲有其象征意义，然与此诗意境无关，此处“红莲”乃敦煌之风光传说。汜瑭彦《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岩泉创修功德记》云：“奇哉岩泉，石化红莲。萨诃授记，引锡成泉。”（S. 2113）可为“红莲”之注脚。盖“石化红莲”为昔日三危山、岩泉附近某时神奇景象，好事者演为神奇传说；同时在敦煌地区流传之神话，尚有萨诃来此“引锡成泉”即以锡杖凿出涌泉之传说，“仙岳”之名实源于此。

“灵山初会应相见，分明收取买花钱。”张文已详注“灵山”之佛典。然则“应相见”者何人？即前引汜瑭彦《记》中提及之晋代名僧萨诃也。S. 4654 卷首即后周广顺四年（954 年，实为显德元年）某氏所撰之《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此有关“仙岳”之文献，与有关悟真之文献抄撮一卷之中，当非随意所为。当日悟真诸人登临仙岳，谈及“石化红莲”之奇特景观与萨诃“引锡成泉”之神奇传说，乃设想他日或与萨诃相会于“灵山”，今日手持之香积饼，恰可抵当欣赏“红莲”之买花钱也。此二句以佛教典故与本地传说结合，描写巡礼所见所思，运典巧妙，想象丰富而语含风趣。悟真之文学风采，于此可见一斑。若外来游方之僧，不谙本地风光与传说者，未必能以岩泉石化红莲、萨诃引锡成泉之“近典”、“乡典”入诗也。

《巡礼仙岳二首》，第一首体现“政治活动家”悟真之思想感情，第二首则显露“诗僧”悟真之才华风度，虽难称诗中杰构，究不失为富有个性之佳作也。以此二诗，比照悟真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及其他作品，句句坐实，诗为悟真所作，或非妄测。

### 3. 时间之考察

张文云：

以此诗所咏史实和创作背景，应当排除此诗作于张议潮时期的可能性。理由有二：一、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起义直至咸通二年收复凉州，其间东征西讨历十余年，远超过五年，此诗所咏与张议潮时期史实不符。二、P. 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张

淮深卒于大顺元年沙州政变中,“时年五十有九”。据此推断,与其父同时遇难的张延鐔死时不会超过40岁,张议潮于咸通二年收复凉州时,张延鐔至多不过10岁左右,自然不可能写出如此即事咏怀之诗。因此,可以断定《延鐔奉和》当写于张淮深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而使河西走廊保持安定通畅的时期。

谨案:此论甚确,第二点考证尤为有力。然而张淮深之六子(有学者考证尚不止六子),非为一母所生,古代男子妻妾成群,常能岁得数子。且古人早慧,又重诗教,数岁即能诗赋并不为奇。张延鐔和诗二首,第一首第三句失粘违律,第二首第一句“东流一带凝秋水”,“流”与“凝”两相齟齬;又写春水而以“秋水”形容,即使如张文所云“秋水”为“明镜”之代称,亦不甚妥。第二句“略尽横山地色分”,语意不明。二诗之结构遣词亦皆嫌稚嫩,用韵亦不规整,第一首首韵“恩”为“十三元”韵,第二韵“君”、第三韵“文”、第二首第一韵“分”皆属“十二文”韵,而末韵“尘”字则属“十一真”韵。当系少年之作,功力尚浅也。故此次巡游之时间上限,疑在咸通年号之中晚期(咸通年号共15年,公元860—874年),即上限最晚不晚于公元874年。

张文云:

这组诗创作年代的下限当不晚于唐末昭宗大顺元年(890)。

谨案:广明元年(880)“律中夷则,蓂生七叶”(即七月初七日),苏翬撰《河西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P.4660),称悟真“耳顺从心,色力俄衰”。盖此时悟真病笃,苏翬已按当时习俗预写邈真赞文,预备后事。此后不久悟真病情幸得好转,已无生命危险,然已半身不遂。P.2748《国师唐和尚百岁书》序文云:“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病废之身,即使康复,亦极少可能登山越水,作巡礼之行。故《巡礼仙岳二首》创作时间之下限,不晚于广明元年。

张文云: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此诗很可能作于中和四年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理由有三:一、诗云“五年勤苦扫风尘”,由光启元年逆推五年是乾符六年、广明元年之间,此后五年恰是张淮深为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东征西讨的时代,与诗

中所咏史实相符。二、诗云“从此穿涉无虏骑”,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中记载当年张淮深一平甘州回鹘之功奏达唐朝后,唐王朝为行封赏,“上下九使,重赉国信,远赴流沙”,再结合上述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敦煌与唐朝使臣互相顺利往来的情况,表明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后河西走廊一度安定通畅,也与诗中所咏史实正相吻合。三、从上文分析可知,《延鐔奉和》诗中对唐朝授予归义军张氏“南阳郡开国公”爵号表露出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此诗写作时间当距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后不久。

谨案:张文以为此诗作于光启元年(885),愚意则以为此诗当作于咸通十二年(871),理由如下:

1. 此时悟真年约六十,任河西都僧统之职已经三年(P.3720《悟真告身》)。是年敦煌二月八日纪念佛陀出家之行像、礼拜等活动由悟真主持,遂有此次巡礼之行。张延鐔年近弱冠(以张文所云咸通二年即公元861年,张延鐔十岁左右推算,此时年约二十岁),诗能成篇,然功力尚浅。

2. 咸通八年(867),张议潭在长安逝世,张议潮应诏入都,河西军政大权由议潮之侄、议潭之子、延鐔之父张淮深主持。至咸通十二年,按吾国古代传统虚岁纪年之习惯,恰已五年,符合张延鐔诗“五年勤苦扫风尘”之说,此“五年”可与P.3451文书《张淮深变文》所谓“五稔三迁”之语参看互证也。所谓“扫风尘”,指抵御入侵之少数民族如回鹘部落。张淮深受命主持河西军务之最初数年,回鹘多次入侵,均遭失败。咸通十年(869)八月回鹘散众进犯瓜州,张淮深将其击退,表上朝廷,唐廷降诏褒奖,并遣使沙州,处理被俘之回鹘部众,放回原籍。咸通十一年(870),回鹘部众再次进犯瓜州,张淮深又率部迎击,于西桐海畔获得大胜。此皆张淮深接掌军务之后五年中“扫风尘”之举也。归义军张氏叔侄二代,张议潮之功在从吐蕃之手夺取河西控制权,使河西重归于唐帝国控制之下,张淮深之功,则在击退周边外族进攻,保持河西地区之安定,短时期内回鹘等部不敢进犯,正所谓“穿沙无虏骑”也。故张延鐔七绝诗第二首以“五年勤苦扫风尘”美其父功,颇得要领。

若依张文所说,此诗作于光启元年(885),则悟真时已病废,难为“巡礼”之行;张延鐔年已三十四五岁,诗作不应如此稚嫩。且所谓“五年”,亦不知从

何时起计。以文献所载张淮深抵御回鹘入侵自咸通十年八月为首次(即所谓“一平回鹘”),至光启元年,张淮深之“勤苦扫风尘”已十余年,不止“五年”。况自乾符三年(876)四月回鹘攻下伊州始,其势力日见增长,广明二年即中和元年(881)十一月后,甘、凉等州渐为回鹘占据,狼烟四起,谓其时“穿沙无虏骑”,与当时现实情况不符,亦与三诗中所显现之承平气象不合。

3. 咸通九年,张淮深重修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又于像之北面新凿一窟,即今世著名之第94窟。此窟营造历时三年,至悟真、张延钊、汜瑭彦三人此次巡礼时,已告落成。关于张淮深新凿一窟(即今第94窟)之时间,学界说法不一。张延钊诗涉及“石壁题名”,汜瑭彦诗涉及“灵龕”,当即指此新凿之第94窟。证以此五首巡礼唱和组诗,知第94窟落成时间当在光启元年(881)二月之前,故荣新江先生关于第94窟始凿于咸通九年(868),三载而成之说,或可得一旁证,张文云:“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间,他(指张淮深——引者)又主持在莫高窟开凿了自己的‘功德窟’94窟,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判断凿窟年代或嫌稍迟。愚意悟真等人咸通十二年仲春之“巡礼”,除普通礼拜仪式外,又于张淮深新建之功德窟为张议潮、张议潭兄弟荐福祈祷,汜瑭彦诗末句之“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即此活动之纪录。“诸公”,当不止悟真一人,张淮深本人亦极有可能参与其事也。

张文云:

此诗中所祝愿的具有三公称号者显然是指当时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而光启元年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无疑当指张淮深。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可以证明,光启元年张淮深业已具有三公的称号(无论是敕封还是自封),而荣新江先生关于张淮深生前没有三公称号,“司徒大概是索勋给张淮深追赠的官号”的推论,或有重新修正之必要。

谨案:荐福对象多为亡者,非为生人,故此论未妥。汜诗所谓“荐福”对象,当指时已亡故之张议潭。而“益三台”之“三台”则指时在长安未归敦煌之张议潮(时为检校司徒,位列三公)。细读汜诗末句,知张文所云“三公……无疑当指张淮深”颇可商榷。文献中并无张淮深被敕授三公称号之记载,若淮深“自封”或索勋等追赠三公称号,变文之类俗文学作

品或以“司徒”指称淮深,尚可理解;而以汜瑭彦之身份及与悟真、张延钊三人唱和之场合论,以“三公”代指张淮深则显然不宜。故此处“三公”当指张议潮。又考张议潮逝世于咸通十三年(872),悟真等巡礼仙岳时间必在议潮逝世之前,否则“益三台”之“益”字乃无着落,“益”者,“益寿”、“益福”之谓也。今判断其唱和时间为咸通十二年,亦与史实相合。

复有可论者,张延钊诗中所谓“南阳一水应天恩”之“南阳”,非指张淮深所受之“南阳郡开国公”爵号,实以张氏之旧望以代指张氏家族。南阳白水张氏,自汉留侯张良之后,遂为显姓,至唐犹盛。故天下张氏,多以南阳为宗源。即使落籍他地,亦仍以南阳白水称望。张议潮之里籍,诸书多称其沙州人或敦煌人,然其家族仍自称南阳人,此循通例,而亦隐示其念祖怀宗之意也。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注云:“李氏《再修功德纪》及《张延钊传》并称‘南阳张公’,举其旧望。”(《丙寅稿》本)故唐廷封议潮等为“南阳郡开国公”,即依其旧望以封爵。“南阳一水”指南阳地区之白水河也。张延钊七绝二首第一首,乃颂其叔祖张议潮、祖父张议潭之功,故有“南阳一水”、“石壁题名”、“功臣古迹”诸说,若颂父功,则不应称为“古迹”也。第二首则颂其父张淮深之功,前已论之。

#### 4. 文卷之考察

S. 4654 卷,卷首有《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一篇,文云“粤惟周之有天广顺,应地之伐,挠之以甲寅泗(四)载,律之于仲吕圆彩,埤萨诞迹,尧冀重芳于八冀”,即后周广顺四年(952)仲春二月八日。背面有杂写一段,有“大周广顺四年”字样,因知此件为五代后周时写本。全卷按内容分,正面11段,背面13段,共24段。各段顺序如下:

正面:

1. 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后周广顺四年(952)二月八日)
2. 文样(结坛文)
3. 唐故归义军节度衙前都押衙充内外排使罗通达邈真赞并序
4. 大乘净土赞
5. 舜子变一卷

荣新江:《归义军大事纪年》咸通九年戊子(868)条,氏著《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页。



6. 佛门问答(拟题。二行)
7. “三危极目條(眺)丹霞”等七言绝句诗四首
8. 百缘经略要
9. 文样(亡孩子文、亡夫文)
10. 杂抄(五更转)
11. 大乘五更转(卷尾残)

背面：

12. 彦楚等赠悟真法师诗抄(卷头残),计有彦楚、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可道、景导、道均、杨庭贯诗十一首,又有法和《赠沙州僧》诗一首有题无诗,下接《悟真辄成韵句》(“敦煌昔日旧时人”、“春景氛氲乾坤泰”、“羌山□长思望东”)三首

13. “玉兔入西昏迷黑”七言绝句诗一首(有脱字)

14. “夜卧涅槃庄”五言诗两句及杂字共三行(倒写)

15. 失达太子雪山修道赞文壹本(倒写)

16. 杂写(“丈夫百岁篇”)(倒写,不全)

17. “清风吊入惠休房”诗(倒写,不全)

18. 杂写(“大周广顺四年”等)

18. 老病孝僧尼名目

19. 杂写(“敕授河西应管内外释门都僧录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等)

20. 起居状

21. 丙午年正月九日至三月四日金光明寺僧庆戒出便斛斗历(笔迹与他件显著不同)

22. 慈惠乡百姓王盈君请公凭取亡弟舍地填还债负诉状(与上件同一笔迹)

23. “敦煌昔日旧时人”七言诗四首

按:此四诗又见于P. 3645背,次序不同。第一首与本卷背前段所录之《悟真辄成韵句》前四句全同,学者因据以定为悟真所作。

24. “巡礼仙岳”七言诗二首并序及“延铿奉和”七言绝句诗二首、“塘彦口号”五言律诗一首

上列内容,计有记文一篇,遯真赞一篇,文样四篇,佛经及问答、变文、五更转等佛教内容文献八段,杂写、节写诗句四段,斛斗历一件,诉状一篇,组诗四段(其中第23、24二段接连书写,实为一段)。

四段组诗中,有彦楚等赠悟真法师诗十一首及悟真诗(“敦煌昔日旧时人”等)数首,可确定作者。另外两组,正面、背面各书一段,即《巡礼仙岳二首并序》(正面无序文)及延铿和诗二首(正面无“延铿

奉和”四字)、塘彦口号一首(此诗正面未抄)。背面之《巡礼仙岳二首并序》等诗五首,紧接悟真“敦煌昔日旧时人”七言诗三首之后,笔迹相同,显为同一人持续抄录。此前研究者将此组诗与《悟真辄成韵句》诸诗分开标示,因皆沿袭英国人斯坦因之文书编号分面,以划分段落,致使《巡礼仙岳》组诗作者不明。若不按斯坦因氏之划分,而自文卷背面起始,定其顺序,则此组诗与悟真之诗相接,作者自当定为悟真。细审原卷,其正面录诗仅四首,背面录诗多出汜塘彦五言律诗一首,以诗数论,背面多于正面,且又多出诗序一篇及“延铿奉和”之四字诗题,当更接近原本面貌,故当依背面之排列分段、考定作者。敦煌文卷之分段、标示,皆当审其内容、察其联系,而不必囿于收藏者与出版者之编号、分段及标示,此亦研究敦煌文献者所宜注意者也。

五诗中之四首重复抄录于正反两面,当源于同一文本,字句小有不同,当系抄录者时有漏误,可互为补校。以文字论,正面所录内容实有胜于背面者。如“三危极目條(眺)丹霞”之“条(眺)”,背面作“耸”;“万里□家去且遥”之“万”,背面作“莫”;“今日同游上碧天”,背面作“今日同日游上碧天”,衍一“日”字;“灵山初会应相见”之“灵(靈)”,背面作“雪”;“分明收取买花钱”,背面漏书“买”字;“南阳一水应天恩”之“水”,背面作“雨”;“五季(年)勤苦扫风尘”之“季”,背面所书字不可识。此类正面文字皆胜于背面。

背面《起居状》前杂写一段,反复抄写“敕授河西应管内外释门都僧录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等内容,此即悟真曾任之僧职官衔,见于敦煌文书。若随手习字,则未必以长达三十馀字之僧衔作内容而背写无误。愚意以为抄写者当有悟真文集或有关悟真之文卷在手,或选抄组诗,或选抄文集中某段某行文字(如僧衔等)。《巡礼仙岳二首并序》等五诗,当在此文集之内。原文集之次序虽无法考定,观本卷抄写之次序,《巡礼仙岳》组诗五首在大中五年悟真长安唱和、《悟真辄成韵句》(“敦煌昔日旧时人”等)诸诗之后,其创作时间在悟真晚年,殆无疑问。本卷中其他杂写段落偶亦抄录诗句,皆为不完整之残篇断句(如“丈夫百岁”、“清风吊入惠休房”之类),当系抄录者随意所写,不如抄录悟真等唱和诗篇之有文本可依,故能段落连贯、内容完整也。

由文卷书写之情形分析可知,文书中四段组



诗,实皆与悟真相关,或悟真自作,或他人赠答。其中两次唱和,一次为悟真大中五年在长安与京城大德、朝官之唱和,另一次则咸通十二年二月与张延谔、汜瑋彦二人巡礼仙岳之唱和。悟真所作《巡礼仙岳二首》及张、汜和诗三首,与悟真其他诗作及他人唱和之诗同编于一集,流传八十余年,犹为世人诵读传写,并长留于敦煌遗书之中,成为今日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历史、文学及杰出诗僧悟真生平艺术之珍贵资料。今日读之,尚可想见当日敦煌一地,虽多年阻隔、频遭战乱,而其地僧俗人士,心系唐朝,即寻常巡礼唱和之中,犹见真情流露,赤心未泯焉。此情此志,实为收复敦煌“缙流有功”之“思想基础”,亦张议潮英雄壮举得以成功之“群众基础”也。

附记:本文初为读书笔记,因极偶然之原因,遂为张先堂先生寓目。先生不嫌鄙人唐突冒昧,鼓励

有加,并嘱整理成篇投寄《敦煌研究》。拙文固无足观,而张先生之热情盛意,至可感佩。因记因缘于此,并致谢忱!

---

参考文献:

- [1] 张先堂. S. 4654 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J]. 敦煌研究, 1997(3).
- [2] 英藏敦煌文献: 第6册(汉语佛经以外部分)[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218.
- [3] 张锡厚, 主编. 全敦煌诗[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4378.
- [4] 汪泛舟, 著. 敦煌石窟僧诗校释[M]. 香港: 香港和平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 129.

---

## 《敦煌学和科技史》入选 2011 年度 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2012年6月8日,2011年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结果揭晓。《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等10种图书被评为2011年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等10种图书被评为2011年度文化遗产优秀图书。由敦煌研究院编,王进玉著《敦煌学和科技史》入选十佳图书,该书为首部全面论述敦煌古代科技史的学术专著。

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评选活动由中国文物报社主办,自2001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10届。自本届起,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活动更名为年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推介活动。《敦煌学和科技史》是甘肃省首部、也是历次评选中第一次获此殊荣的敦煌学研究著作。